

林慶彰 主編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
出版

中國學術思想

研究輯刊

二 編

林 慶 彰 主編

第3冊

“無名”與“正名”

——論中國上中古名實問題的文化作用與發展

丁 亮 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無名”與“正名”——論中國上中古名實問題的文化作用與發展／丁亮 著——初版——台北縣永和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8〔民97〕

目 2+310 面：19×26 公分（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二編：第3冊）

ISBN：978-986-6528-04-0（精裝）

1. 名家 2. 符號學 3. 文化價值

121.5

97016504

ISBN - 978-986-6528-04-0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二編 第三冊

ISBN：978-986-6528-04-0

“無名”與“正名”

——論中國上中古名實問題的文化作用與發展

作 者 丁亮

主 編 林慶彰

總編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行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行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封面設計 劉開工作室

初 版 2008 年 9 月

定 價 二編 28 冊（精裝）新台幣 46,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無名”與“正名”
——論中國上中古名實問題的文化作用與發展

丁 亮 著

作者簡介

丁亮，江蘇南通石港人，民國五十二年臺灣高雄出生，愛好中國文化、中國文字與書法，碩士師從 龍宇純教授完成碩論《說文解字部首及其與從屬字關係之研究》，博士師從 唐翼明教授完成博論《無名與正名：中國上古中古知識分子的名實運動》，現任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研究主以現代符號學的角度探索中國古代名實問題，嚐試從符號認知的觀點重新詮釋文字、文學與文化的互動關係，以融合中西，恢復中國人文傳統，建立新時代的中國符號學。目前則以《老子》文本為對象，在符號觀點下針對文本的認知圖式、詮釋、形成、用字與修身、聽治等文化作用進行一系列的深入探討。

提 要

符號學／中國符號學

《無名與正名》旨在探討語文符號在社會文化中的具體作用，因以中國上中古名實問題的作用與發展為進行研究的實際對象，而此一名實問題的文化作用與發展即是“無名”與“正名”二名實觀點作用與發展的過程，故以之為題。研究主要分為兩部分進行：第一部分主從“共時”的角度切入以觀察名實問題在社會文化中的作用層面。觀察中發現名實問題實為中國文德傳統的核心，其核心議題乃是價值表述而非邏輯推理。基於價值表述，名實問題在中國文化中促成了價值（道與事）、表述（書與言）、知識分子（仕與隱）三個相關範疇，並在無名與正名觀點下，分別形成了相應的理論（名實離與名實合）、表現（詭辭清言與書法正字）和意識型態（自然主義與人道主義）；第二部分主從“歷時”的角度切入以觀察名實問題在歷史發展中的推動作用。觀察中發現因周人文德衰敗而有了名實問題，先秦諸子紛紛提出理論對策，其中正名觀因集中權力的特質而首先在秦漢時登上歷史舞台，完成兩漢名教，後因虛偽狡詐分裂衝突的弊病而衰敗。繼而無名觀憑其重視人心之天真簡靜而於魏晉登場，在魏晉時推動自然，其後則因浮華不實的弊病而為人棄。最後，實際經歷過正名與無名的施行後，知識分子取其利而去其弊，在體用模式下融合了無名與正名，並且形成新的“假名”觀，從而開創了隋唐盛世。本文以現代符號觀點重新闡釋中國名實傳統，不但可對現有之小學、文學與思想研究有所激發，而且將對中國之文化傳統有更深刻的體會。



目

次

第一章 前 言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緣起	1
第二節 研究途徑與對象	3
第三節 研究價值與意義	7
第四節 研究態度與方法	9
第五節 論述的程序	16
第二章 名實問題的文化視野	21
第一節 核心議題：價值表述	21
第二節 相關範疇：價值、表述與知識分子	31
第三節 文化背景：文德	45
第三章 名實問題的基本主張（一）——無名觀	55
第一節 基本理論：道之性質與名實相離	55
第二節 符號運作：詭辭與清言	64
第三節 意識型態：自然主義與個體覺醒	78
第四章 名實問題的基本主張（二）——正名觀	89
第一節 基本理論：名實相合與成事作用	89
第二節 符號運作：書法與正字	96
第三節 意識型態：人道主義與群體倫理	107
第五章 名實問題的發展（一）——先秦理論發 展期	119

第一節	名的省察	120
第二節	老子“無名”與孔子“正名”	125
第三節	無名與正名的交鋒（1）：“名辨”與“形名”	132
第四節	無名與正名的交鋒（2）：“齊物”與“正名”	141
第六章	名實問題的發展（二）——兩漢名教實驗期	151
第一節	正名主義擅場與名教初立	152
第二節	名教的擴張與讖緯	163
第三節	由國而家的轉向	180
第四節	名教的衰敗	193
第七章	名實問題的發展（三）——魏晉自然實驗期	205
第一節	自然主義的興起與初立	206
第二節	自然主義的擴張	215
第三節	東晉的轉向	225
第四節	自然主義的衰落	236
第八章	無名與正名的融合與成果	249
第一節	自然與名教的融合與體用	251
第二節	價值系統的初立	261
第三節	表述方式的解放	266
第四節	知識階層的搏成	274
第五節	價值表述的新觀點：假名觀與境界	280
第九章	結語	293
	重要參考資料	303

第一章 前 言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緣起

生命如此奧妙，豐富而多樣。有時面對著浩瀚的宇宙和人世的繁華不得不讓人嘖嘖稱奇，覺得世界充滿了神祕與生氣；有時面對著孤寂的自己和內心的空虛則又不得不令人無力與絕望，感到人生毫無意義與生趣。對一般人而言，可能更多的時間是在現實生活的得意與失意、歡樂與煩惱中度過，有時想積極努力的追求什麼，有時則想放棄所有清靜一下；有人憂慮著婚姻的破碎，有人滿足於親子的融洽，或許更有人思索著生死的問題，靜靜的在天空下坐著，想著人生的意義為何？人生的價值何在？人和萬物有何區別？累了，便休息一下，偶而抬頭，可以望望天上千古不變或一瞬不止的白雲。

而這宇宙人生的一切究竟是怎麼回事？是透過我們的思考產生的嗎？當我們專注的推求人生合理的答案時，似乎是的；是透過我們的感官嗎？當我們在風中小心翼翼的去觸摸柔弱艷麗的花瓣時，似乎是的。然而還有一種聲音，告訴我們，這一切繁華、富麗與意義是從我們的語言來的，從人類所創造的符號來的，因為唯有憑藉著語言人才能思考，因為「語言是聯繫自我和世界中介」，「語言使自我和世界在其原始的依屬性中得以表現」，〔註1〕因

〔註1〕參詮釋學學者加達默爾語。見《真理與方法》，602頁，漢斯——格奧爾格·伽達默爾著，洪漢鼎譯，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3.10初版一刷。本論文引用書籍資料皆於首次出現時註明著者及出版資料，其後再次引用時則予以省略。

爲「唯語言才使人能夠成爲那樣一個作爲人而存有的生命體」，〔註2〕因爲人是「符號的動物」。〔註3〕故而，當我們想要瞭解人、或其生活、或其社會、或其文化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時，我們可以從其語言、文字與符號進行研究，一如文化人類學者雷維史陀所爲，〔註4〕甚至是文化發生問題時亦可從語言文字等符號著手，因爲許多人生問題是因語言而發生的，本無真實存在的問題，因爲我們依賴語文符號思考、感受、獲取意義與存在。

然而一切真的都只是從語言文字等符號中產生的嗎？所有的問題都可以在語言文字或符號中得到透視嗎？我能夠在語言文字上解決我的課業問題嗎？我該學嗎？或者我自然不學？我能夠在語言文字上解決我的孤獨與絕望嗎？孤獨是由“我”這個名詞產生的嗎？如果沒有“我”這個名詞還會有“我”這個觀念嗎？還會有所謂的孤獨寂寞嗎？沒有孤獨寂寞就是佛家所講的無我境界嗎？又我可以在語言文字中面對我與父母的衝突嗎？衝突是來自親子名分嗎？我可以在語言文字中得到人生至高的喜悅與滿足嗎？佛教的法喜是否如是？還是要到沒有語言文字的不可思議境界才能得到無上正等正覺？可是沒有“佛”這個字要如何推行佛教？如何學佛？修佛人修了半天是否只是在修一個字呢？修道者是否亦如是？甚至所有人生的追求都是這樣嗎？我可以這樣問嗎？我的問題存不存在呢？我從建築轉到中文爲的是什麼呢？所唸的中文又是什麼？文學是什麼？我的人生在追求什麼呢？甚至，生死問題也可以這樣解決嗎？如果沒有“死”這個語言是不是就不會有“死”這個觀念？然後就可以免去“死”的恐懼而解脫？真的可以或不可以嗎？或者我們該去對這些問題的成立與否進行思考，實地去認真瞭解語言文字與符號對我們生命、生活與社會文化的作用，並更進一步的理解文化、生活與個人生命的關係。

因此，語文符號在文化中的具體作用便值得我們悉心關注。去觀察語文符號是怎麼影響個人的觀念與意識，去觀察語文符號是怎樣促成眾人的共識與行動。因爲，如果所有人生的價值與意義都是由語言文字而來，那麼，我們就只

〔註2〕參海德格在〈語言〉一文中所轉述威廉洪堡的說法。見《走向語言之途》，1頁，馬丁·海德格，時報文化，1996.10.初版三刷。

〔註3〕參卡西勒在《人論》第二章〈符號：人的本性之提示〉中的論述。見《人論》，39頁，甘陽譯，桂冠圖書公司出版，1991.5.初版二刷。

〔註4〕參《形名學與敘事理論》一書的介紹，125～132頁，高辛勇著，聯經出版，民76.11初版。

能透過語文符號去認識世界，只能透過語文符號去行動創造，是以我們不能不去分析語言文字的特性，看看語言文字等符號是否能夠適當的呈現意義、表達意義，猶如戴著眼鏡去看世界時，人們必得瞭解這副眼鏡的特性才行。

第二節 研究途徑與對象

然而，我們該從什麼樣的途徑去認識語文符號在生命與文化中的實際作用？如智者在狹小的斗室中冥思？如社會運動者在廣大的街頭實地操作口號文宣？如媒體記者口水與筆墨齊用？或如教徒般忠實地遵循著語文所寫下的教條？還是只是在生活中老老實實、一點一滴的關注著、運用著與反省著自己所說的話、所讀的書與所寫的字？或是抱著學者冷靜客觀的態度在某專業領域中研究？似乎沒有一條必然的途徑可以成為最適切的答案，但是，我們若著眼於語言、文字與符號的溝通本質及由此而生的影響與作用，理解的進行當先囊括語言文字在社會文化與個人生命中全面的作用。這不單單因為瞭解某一對象本當包括此一對象的全部範圍，更因為語言、文字與符號的本質即是溝通與互動，溝通某甲或某乙，如果我們所採用的研究途徑只包括了甲而忽略了乙，便不只是缺失了語文符號在某乙上的作用，而且亦將缺失語文符號在某甲和某乙上的互動情形，因而對語文符號在某甲上所產生的作用亦無法全然看清。更重要的是，觀察語文符號作用的重點可能正在甲與乙所產生的互動與溝通上，互動與溝通所形成之二者關係才是觀察的重點，而不單是落在甲與乙二實際對象上，因為語文符號的作用就是溝通互動，而只劃定溝通成員之一為研究對象將看不到溝通互動的全貌。也就在此溝通互動的特性下，語言、文字與符號的作用趨向“全面”發生，只要語文符號出現，其作用對象就必然從現有之使用對象向外延伸，而在一整體的社會文化中全面作用，從此一“全面”性來看，歷史研究成為瞭解問題最適切之入手途徑。

“歷史研究”為語言、文字與符號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全面”的視野。所謂“全面”，指的是語文符號趨向社會文化與個人的全面的可能，因為歷史可說是人類社會文化所形成的綜合總體，故而“歷史研究”能夠提供一個足夠寬廣的視野來容納語文符號所有可能的作用對象，以便完整的觀察語文符號在具體社會文化中所產生的互動實況。事實上，將“歷史研究”視為研究語文符號的初步途徑不但是在研究對象的取捨上較為全面，相對的，在研究

的立場上也較為全面，因為“歷史研究”的途徑包含了上述所有途徑，個人的、社會的、心理層面的、物質層面的等等，同時也綜合了所有途徑的眼光：不單取智者的眼光，但是觀察如老子、孔子般智者所產生的符號觀點及此一觀點與社會文化的互動；亦不單取社會運動的角度，但是注意如名教、自然等社會風潮和語文符號的關係及其對個別知識分子的影響。於是以“歷史研究”為途徑可以去除各種學科研究性質上的限制，減輕研究者個人主觀的扭曲與侷限，較適切的掌握問題全貌。

而中國歷史本有一個強大的“名實”傳統。此一傳統從西周延續至清末而貫串整個歷史，在其中，語文符號在現實中的作用以三個層面呈現：一是從理論層面對語文符號進行的省思，省思名和實的究竟關係，或主張名實合，或主張名實離；一是在運用層面對符號進行的具體操作，在特定的名實理論下去塑造運用語文的特殊方式與活動，如書法、正字、詭辭、清言等，並由此產生一批語文符號以在現實社會中發生影響，如仁義、道德、自然等等；一是對於符號構成的媒介進行審視，思考文字視覺媒介和語言聽覺媒介在認知和傳播上的特質，並予以利用而創生出種種符號形式，如經典、金石文字、吟誦、唱導等等。於是，在這個傳統中我們得以更清晰的觀察到語文符號是如何在現實社會中對群體和個人生命產生作用的。

從中國上古至中古約一千五百年間“名實問題”的作用與發展則初步提供了一個觀察與學習的具體對象。問題最初始於知識分子對“名”的反省風潮，蓋周初周人制禮作樂以文德建國，至西周末年天子勢力衰退，禮樂崩壞，文德觀念動搖，於是名實關係受到質疑與反省，從而形成“名實問題”。而自一開始知識分子便對問題之解決形成“無名”與“正名”兩種相異而對立的觀點，相互抗爭，從而使“名實問題”在中國歷史中形成長期的作用與發展。經過不斷的思辨與實踐，知識分子才澄清了問題本身及其所涉及的各個文化層次與面向，掌握其中各種可能的具體措施，終於在南北朝時融合了“無名”與“正名”兩種觀點，結束了二者的對立。而此一名實問題的反省風潮除了從現代遠距離的觀察加以確定外，在當時即具有獨立性與連續性，知識分子極具意識的對名實問題進行反省、討論與實踐。雖然這些行為並不是由某一批特定的知識分子為刻意完成什麼社會目的而掀起，行為的發生也不限定在同一時空，但透過這些行動，我們可以確定名實問題已在知識分子心中被認

知爲一具體存在的問題，是以此一問題得以從歷史整體發展之諸多雜亂現象中脫離而擁有獨立的地位。特別是語言文字本身具有強烈的獨立性與連續性，即使歷史現象糾纏拼湊，即使歷史發展偶然斷續，但語言文字在共時的運作上必得具有自身之系統與規律，在歷時的發展上亦必具有相當程度的連續性，否則語言文字無法運作，亦將消失，是故以語言文字之獨立性與連續性爲基礎，名實運動的獨立性與連續性也就更穩定了。在有意識的行爲之上，名實問題發生、發展而後結束，故得以從歷史的洪流中劃出而成爲一獨立而連續的研究對象，研究此一對象不僅可知語文符號的問題早在中國古代數千年前已爲知識分子所重視與討論，而且可以瞭解語文符號在整個社會文化中的全面作用，從宇宙世界的宏大建構到個人意識微渺的刻劃。是以名實問題的內容便成了本論文的研究內容，名實問題之文化作用與發展則成了本論文的研究對象。

從研究的實際內涵來看，整個名實問題的發展則可視為“無名”與“正名”兩觀點對立與吸收的互動過程。在其中，知識分子對語言文字等符號問題分別從正反兩面做了深入檢討，從而形成兩派意見：一派學者以爲語言文字等符號所形成之“名”對人的生命、社會與文化具有負面作用，“名”非實，非天生自然之物，而爲價值與意義在人心異化而成，因爲價值無形，而符號有形，有形便可模倣假裝進而欺騙，故自有了語言文字等符號後人心變得澆薄虛偽，失去純樸，因此當主“無名”。此一觀點又進而擴展成以老莊爲代表的道家思想；另一派學者以爲語言文字等符號雖有缺陷，但是具有強大的社會功能，能夠完成各種事功，乃爲建立社會共識與形成社會規範不可或缺，因爲符號能將無形之價值與意義化爲具體可識的語言文字，而爲大家所共同遵守，是以“名”對人類社會與文化的建構具有積極而正面的作用，只要盡量減少其負面作用便可，故當“正名”。此一觀點又進而擴展成以孔荀爲代表的儒家思想。於是“無名”與“正名”就成了名實問題中最基本的主張，持無名觀念者主張名實相離，持正名觀念者主張名實相合，而二者之差異、矛盾與衝突一時無法合理解決，因而形成了長期的發展，發展就在“無名”與“正名”兩觀點的相互抗爭下持續進行，兩觀點分別努力發展自己的理論，擴充自己的勢力範圍，但也相互融合吸收，以修正自己的缺失，抵制對方的批評，直至最後，知識分子融合了無名與正名的觀點，終於對名實問題獲得了一致的看法，並以此爲基礎而開展出下一階段的歷史發展。

是以《“無名”與“正名”》就成為本論文研究之題目。^{〔註5〕}因為“無名”與“正名”兩觀點的基本主張與二者互動的過程就是論文最主要的研究內容，但是這裏所要特別說明的是，用“無名”與“正名”為題目固然是因為這是在西周至南北朝間最主要的名實主張，是以論文前半部是分別介紹這兩種的基本主張，論文後半部是論述這兩個觀點相互鬥爭與交融的過程，但是我們也可以把“無名”與“正名”視為面對符號的兩種趨向，這樣，“無名”與“正名”就涵蓋了此一時期所有的名實觀點，而不受到一般思想史上一家一派的限制，是以無論是老子無名、孔子正名、黃老形名、墨家名辨或法家名家等等的名實學說，莫不包容在此題目範圍中。事實上，在先秦以後，黃老形名與墨家名辨等觀點內涵亦融入在“無名”與“正名”所形成的大流中，故如漢宣帝為政王霸並用，兼採法家刑名，但仍主正名，其它如魏武帝重申商刑名、傅嘏校練名理、王坦之好形名等亦皆為後世史家論述，但當事人自己並未將其由正名或無名的大潮流中脫出而予以獨立標舉，唯有完全著眼於名實而不分家派的做法才易於掌握整個歷史發展的實況，是以本論文題目中的“無名”並不專指老子之無名，“正名”亦不專指孔子之正名，而是指這兩種超越家派的名實主張在整個歷史文化脈動中的實際作用。故此，為強調實際作用的焦點，另外加上“論中國上古名實問題的文化作用與發展”為論文副標題，以利讀者瞭解。

〔註5〕又筆者雖未見古人直接將“無名”與“正名”二者語辭對舉論述者，但《老子》以“無名”與“有名”對舉，有名其實即意謂著要正名。至於老孔二人之後的“形名”學派確實是結合“無名”與“正名”二者而成，《黃帝四經》中即同見二詞，至《尹文子·大道上》「無名，故大道無稱；有名，故名以正形」，則更是將無名、有名、正名等觀點共論。而後世論名實之諸多議論中亦往往可見“無名”與“正名”二派學者相互批評的現象，如《莊子·天道》篇末以「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闡發無名觀點時即藉輪扁之口將君王所讀聖人書說為「古人之糟魄」，而經典卻正是正名觀點所大力提倡。很奇妙的，《韓詩外傳·卷五》篇末亦提到輪扁的故事，但篇中讀書之笨君主從北方的齊桓公換成了南方的楚成王，而在此段文字之後則是「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子」的故事，藉著正名主義所慣用的本末型態孔子「聞其末而達其本」，在學樂之中層層漸進而得文王之“數”、“意”、“類”，從而反向操作了言不盡意的議題，並在此後又安排了孔子「正假馬之言」以正名的故事，不但本身是以正名反駁了無名的觀點，而且在論述上明擺著是針對《莊子·天道》之文而發，可知“無名”與“正名”二者確實是同存於古代知識分子心中。

第三節 研究價值與意義

誠然，這樣的研究主要是為了透視語言、文字與符號在現實中的全面作用。因為此一全面性的視野有益於透視符號在個人生命與社會文化中之各種作用與種種作用間的互動，對一般個人瞭解其自身生命或社會運動者瞭解群眾均有助益。如果一般人不得不透過語言文字等符號來建構與表達生命的價值與意義，那麼，語言文字等符號之特質也必然影響人生價值之建立；如果一般人對事物的思考與認知不能不依賴語言文字等符號來進行，那麼，語言文字等符號之特質也必然影響一般人的思考與認知，於是語文符號化生成具體的行動與事件，形成具體的歷史，是以理解適合在一歷史的視野中進行，雖然，我們觀察的目的也許只是爲了自己一人。而於此一般性的意義之外，此研究對學術的發展亦有其不可忽視的價值。

首先，此全面性的研究成果在現代足以成為各個學科研究語文符號的總體參考框架。學術分科本爲推展文化所施行的精密分工，是以各學科各有其專業領域，但語文符號的研究要求全面，各學科對此所進行的研究就容易見樹不見林，而歷史研究所呈現的全面作用則可爲總體性的參考框架，使各學科中之符號研究者能以此爲準而爲自己的符號研究定位。然而名實問題具體發展中所呈現的符號整體作用尚可作爲不同領域之研究關係的參考，從各學科之符號研究者來看則是在符號議題上提供了可能相關之領域的參考，以及各種可能的互動情形。特別是符號在不同學科之研究領域間所生之互動永遠不會成爲單一學科研究中的主角，只能在跨領域的研究中出現。更重要的是從個人到社會、從形而上到形而下、從性情到功利這種種間的整體互動情形是任何跨領域研究也無法取代的，只有在歷史研究的實際觀察中才能看到若老子般智者個人的沈思轉化成魏晉時社會群體普遍風潮的過程，這絕不是跨越兩三個領域的研究即可做到的。語言學、符號學、詮釋學、哲學、心理學、美學、社會學或人類學等每一學科因其性質而生之特定視野讓語文符號的研究更專精，讓我們更深刻的認識了語文符號的重要性，但是語文符號在人類社會文化中的整體作用則只有歷史研究能夠提供，而此整體認識則可成爲各學科研究進行時的參考框架。不過在此要再強調的是歷史研究所展現的符號作用領域對現代社會來說只是一種可能，而不是一種必然，是以對現代之學術研究基本上只具有參考意義。

其次，對於瞭解古人的思想觀點、思維模式與意識型態等種種心靈活動具有巨大的價值。因為唯有符號能傳達價值與意義，唯有符號能自由的進出人心，特別是語言文字，因為沒有實存的形體，故而能自由的穿梭於人與我、彼與此、古與今間，而且古代文獻不但可視為古人心靈的直接表現，而且具敘述與討論語文符號態度和觀點的作用，因而在表現之外還有再現的功能，這是所有其它媒介都不具備的功能，一件出土的器物雖然可以視為當時代生活的直接表現，但此表現卻要經過現代人的詮釋；一幅古畫雖是古人美感的親近表現，但這幅畫所蘊藏的美感卻必須經由現代學者解讀。可是語言卻可以述說其自身，如器物中的雄壯得經觀者詮釋，在理解上隔了一層，可是語文卻能直接說此雄壯，無論是透過意象或“雄壯”一辭的直接書寫。更重要的是語言文字是最純粹的符號，在其符號形體的完成上可以沒有任何實質限制，因為語言文字只是符號，不像其它考古事物，如秦始皇的馬車，因其現實機能與製造技術而不能成為一種自由的符號，至少，馬車的輪子得是圓的而不能是方的；又如周人的鐘鼎，在其形體上亦必然受到禮制與財力的約束。從地下考古事物，如城鎮、陵墓、宮殿、車驕、器皿甚至圖案，我們能很容易的重建古人具體的生活，但是要進入古人的心靈世界，去瞭解這些器物具有什麼意義、為什麼會產生古人這種生活、當時的價值是什麼、古人的觀念是什麼、古代文化的思維模式如何等等問題則非依賴語言文字不可，因為語言文字直接述說了古人的心靈，這是其它考古事物所無法做到的。而我們從古代來，至少就我們的研究對象而言，中國文化還是一個活生生的文化，古代文化的影響依然強烈存在，是以對古人心靈的理解自然有助於對現代心靈的理解，當然，前述現代學術對符號作用與性質的澄清，自然亦有益於古代社會文化的理解。其實基於符號的溝通特質，符號的研究本就會穿梭於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所有的研究都只是一種對話，彼此詮釋的過程，在此過程中，我們看到對方，也呈顯自己，在符號的歷史研究中，則是進入了古代，也體現了現代。

最後，這樣一種對語文符號和人與文化互動的研究自然是對符號與人互動關係的探討最具意義，因為這也就是整個研究的中心。這種探討或許可以成為一種風潮而在政治、經濟、內政、娛樂、出版等等具體生活領域中為人運用與發展，亦可在人類學、社會學、經濟學、宗教學、文學、美學、傳播學等各個學術領域中受人重視而成為現代學術的研究主題，甚至自行獨立創

建成一門學問，或許西方的符號學已然如是，因為語文符號種種問題的核心在溝通、互動與關聯，是以就這個問題本身的性質來說，應該受到全面的觀照，至少，應該有一個地方可以觀照到其全面的狀況，來對符號的特性與功能予以研究，進行更深的反省與認識，特別是語言文字具體的操作與個人內心生命情態間深刻密切的關聯，這是我們進行這個研究的根本出發點，也期望這篇論文最後能發生點問路石的小作用。

第四節 研究態度與方法

而我們該如何進行這個研究？用什麼態度才能“全面”的觀察？用什麼方法才可進行“歷史研究”？憑什麼東西來理解此一“名實問題”？怎麼樣才能如實的看到“無名”與“正名”二者的作用與發展？

就“全面”這點而言，韋伯（Max Weber）在社會學中所提出的“理解”觀點足為我們參考。韋伯以為“理解”有「直接觀察的理解」和「解釋性理解」兩種，當我們進行理解時固然要先直接觀察一些事實以進行理解，但還應當根據被觀察者的「動機」來解釋事實，「對一個涉及行動之意的學科而言，“解釋”意味著能夠掌握到根據行動者自己的主觀意義，他的行動所繫屬其中的意義關聯」。^{〔註 6〕}也就是說，在「解釋性理解」中研究者自己不採取任何預設立場與任何學科之既成理論，而只是依據研究對象自身來進行一種純粹的觀察與理解，以免削足適履，這樣，便可以形成全然開放的“理解”，而依據語文符號在事實中之開展來觀察其全面作用，因為所謂“全面”指的並不是某些固定的內容、劃好的範疇或僵硬不變的框架，而是一種沒有限制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使語文符號的作用可以隨機流通，或可從甲而乙，亦可從乙而丙，更可從丙而甲，研究者不應該預先設定立場限制對此事實衍變的觀察，而應順從符號自身的角度來理解這種演變的事實。

然而全然開放的理解仍有其理解進行的條件。因為詮釋與理解必然在詮釋與被詮釋者間進行，而此實在之二者必有其特殊的時空背景，是以理解進行時仍將有其特殊的條件，只是我們不預設立場，避免使用第三者的眼光來進行理解，特別是價值判斷，是以這些條件不從第三者而來，但研究者本身

〔註 6〕參《社會學的基本概念》，25～27 頁，韋伯著，顧忠華譯，遠流，民 82 初版。

仍與研究對象同處於歷史洪流之中，並不具有任何超越的立足點，是以研究者本身之條件必將影響觀察與理解的結果，因為這是一項詮釋的工作。事實上，我們得先肯定研究者立場在理解中的意義，理解才得以進行，因為觀察或理解總是在觀察者與觀察對象間發生，因此理解進行的條件或者是限制，相反的，亦可成為進行理解的基點。就詮釋對象而言，我們當儘量以其自身來看其自身，進行一種同情的理解，盡量去傾聽那個時代的聲音，而避免用其它時代的價值或觀點來瞭解、判斷甚至批評它，這也是文化人類學的基本觀點。很幸運的，和其它研究比較起來，我們所研究的對象自身特別容易顯現，因為語文符號同時具有“表現”(presentation)與“再現”(representation)功能，它不但是它自己的表現，而且可以述說它自己的表現，這也就是再現的意思。故當時代的人透過語言文字不但可以讓自己成為演員，也可以讓自己成為觀眾，使自己成為當時代的理解者、詮釋者與批判者，如王符《潜夫論》所為，於是我們較其它研究更容易的理解了時代自身，不是透過我們的詮釋，而是透過當代人的觀察，因為語文既可表現又可再現，是以我們可以在語文中批判語文自身。可是這種傾聽並不是完全沒有隔闔，我們透過王符的話去掌握東漢末年的社會，但對王符的話仍要詮釋，而且，要用對我們現代有意義的觀點和術語去詮釋，因為，這本來就是我們進行理解的基點，也是研究進行的目的。

而基於對語言、文字等符號與人互動的研究，本論文採用了現代學術中“符號”(SIGN)與“意識型態”(IDEOLOGY)兩個觀點。符號觀點是用來引介名實，在索緒爾的定義下，符號為“能指”(SIGNIFIER)與“所指”(SIGNIFIED)的綜合體，〔註7〕雖然我們不能直接用能指與所指和名與實兩兩對應，〔註8〕但亦不能否定此種對應在有形與無形上的一致，是以可用符號

〔註7〕參《普通語言學教程》，第一編第一章第一節，索緒爾著，弘文館出版，民74.10初版。

〔註8〕指在整個名實運動漫長的歲月中名與實二詞所指不定，這一方面是歷史因素造成；一方面是語言問題造成。就“名”而言，其在運動最初尚無實一範疇時指的就是符號整體，包含了能指與所指兩部分。到名實範疇分立之後，在不與實一範疇對舉的論述情形下，內涵往往亦包含能指與所指兩部分。即使是在名實二詞對舉的情形下，內涵有時亦包含能指與所指兩部分，因為索緒爾對所指的定義是符號中的概念部分，而非實物，可是中國文化中名實的實則往往是指具體實物，因其討論的主要是政治道德社會文化等現實問題，是以此時名的內涵就包含了所指概念與能指形象兩部分。就“實”而言，除了